

西南學刊



第三輯

主編
詹七一
冉隆中

云南出版集團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西南學刊

第三輯

主編
詹七一
冉隆中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南学刊. 第3辑/詹七一, 冉隆中主编.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222-09547-2

I. ①西… II. ①詹…②冉…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8690 号

责任编辑 范晓芬 胡 萍

装帧设计 蒋 群

封面设计 西 里

责任校对 范晓芬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西南学刊 (第三辑)
作 者	詹七一 冉隆中 主编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625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德范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9547-2
定 价	35.00 元

本书编委会

顾 问 梁晓谷 陈世波 汪叶菊

学术指导 张文勋

名誉主编 桂彦南 梁永实

主 编 詹七一 冉隆中

副主编 吴彦勤 杨 勇 黄 毅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邓 瑶 孔德明 田玉玲

申 江 冉隆中 吉永生 刘玉环

阳正伟 李 森 李 骞 杨 勇

胡 彦 段炳昌 黄 毅 詹七一

蔡 毅

主 管 昆明学院

主 办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目 录

文化昆明

多少事，从来急

——我看《昆明的眼睛》……………仇 和 2

西部地区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意义

……………李 锐 张德寿 6

新形势下，文联何为？

——以昆明市文联为例……………昆明市文联课题组 27

西南视角

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以云南为例……………吉永生 42

治理滇池的哲学思考（上）

……………蔡 毅 61

创见、想象与文笔

——《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序言……………段炳昌 80

宋代西蜀才子苏舜元传……………周兴涛 91

如果雨果的哈尔威船长说了假话……………胡 红 100

西南文化研究

岭南苗族瑶族乡规民约述论（二）……………过 竹 黄怡鹏 107

礼之于器的葬礼表达

——对古滇国青铜艺术的重新审视……………田红云 122

西南文学研究

以《风》为镜看林子

——评林子《爱者的世界》..... 项兆斌 136

在家乡那块邮票大小的地方开掘

——论吕翼的“杨树村”农村题材系列小说 ... 艾自由 149

沈从文小说开头艺术初探 周星平 160

西南艺术研究

远观《云南秘境》: 更非自圆其说(下篇) 栗原小荻 169

尘嚣涤尽 镜鉴乾坤

——再论栗原小荻《云南秘境》绘画系列的精神品质
..... 邓添天 176

西南历史研究

白子国散议 杨爱民 187

清末民初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 谢 溶 201

云南报销案与晚清同光之际的南北纷争 孔 勇 208

抗日战争时期党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经验

——以云南为例 蒋光贵 232

西南语言研究

马王堆汉墓遣策名物考 刘玉环 248

罗定《龙龕道场铭》碑异文考辨 周宗旭 256

试析缅甸独立后语言地位的演变及其原因 赵 燕 261

昆明作家影响力研究

我为什么要编《昆明的眼睛》 冉隆中 270

那些温情的目光

——欣赏《昆明的眼睛》 吴 然 272

昆明的眼睛昆明的书	边 氏	275
什么也不能阻挡我们爱美	左丘失明	277
文化昆明的精彩呈献		
——读《昆明的眼睛》	张永权	279
眼波，流转过尘埃		
——评《昆明的眼睛》	王 韬	284
借双慧眼“读”懂昆明		
——名家名作汇成《昆明的眼睛》	吴亚顺	287
跋		289

文化



昆明

多少事，从来急^①

——我看《昆明的眼睛》

仇 和

(中共云南省委)

不知不觉间，来昆明工作已有三年零九个月时间。

记得在我青少年时期，学习作文，文章开头特别喜欢用两个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当然是用来形容时间过得飞快，变化日新月异。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去看，那个时代，用那样两个词去形容，实在是夸张了些。如果跟今天的速度和变化相比，那时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只能叫“慢生活”。小时候，在乡下老家，我是从杨柳枝头打苞吐绿，知道春天来临的消息；肚子能吃饱了，我知道是夏收了、秋收了。那时，几乎所有人，都按时序更替、季节轮换，过着自然而“诗意”的生活。但是，“诗意”却未能改变现实的严酷。对我来说，最严酷的事实是，当夏收和秋收那紧张忙碌的几天过了，肚子就经常饿得咕咕叫了。不能吃饱饭，哪里还有什么“诗意”可言呢？

我已经不能准确地说出，从什么时候起告别了“慢生活”。但是每个工作和生活当下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如今节奏明显加快了。很多人出行选择了飞机，高速公路蛛网密布，铁路也进入“高铁”时代。无处不在的通讯工具和互联网，更缩短了人与

^① 本文是作者为《昆明的眼睛》一书所写的序言，现征得作者同意刊载于此。

人的距离。面对这样的改变，现在反而没人使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样的词了。这大约是因为，节奏的加快，已经可以很轻易地从工作和生活中感知到。

就我个人而言，平时说话语速、走路步速、工作节奏，可能会快一些。有的同志看我精力过人，跟我打趣，问我嘴里是不是随时含着人参？我也以玩笑的口吻回答，可以把“人参”二字改为“人民”。心中有百姓、胸中有事业、肩头有责任，每天多干几小时，多做几件事，不正是在延展人生的长度和深度吗？

昆明的历史和气候，让昆明人性格中多了些“温吞”的特征。我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几年，也感到这里四季如春，确实“好在”。但是如果“好在”只是带来了“温吞”的个性和“慢半拍”的节奏，恐怕就会慢慢变为“不好在”。因为你在“好在”中悄然入眠，别人却在勤奋工作中不断进步，就可能由“好在”变为落后。所以，我主张把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过得丰富而精彩，这样就等于延长生命、创造价值。

工作的节奏加快了，效率提高了，当然是好事。然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我听说，与我共事的一些女同志，在开现场会时，不敢穿高跟鞋，一些人甚至说要少喝水，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才能跟上会议进程。当然，我知道，女同志穿高跟鞋可以增加美感，多喝水有利身体健康。今天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慢生活”，究其本意也是不错的。如果有时间，品一杯香茗，读一本闲书，赏庭前花开花落，看天空云卷云舒。这样的日子，未必只是古代的士大夫才会喜欢和有资格消受。但是我只能欣赏，却没有心情体验。因为，我时常会想起毛泽东诗词中的名句：“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哪还有闲暇和心情去过所谓的“慢生活”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匆匆赶路，是环境使然、责任所系、别无选择。

尽管如此，但每个人都还是有慢下来的时候。比如，夜阑人

静时，我就习惯静静地读一些书。读书可以说是投入少、产出高、收获丰，也是我最喜欢的—种“慢生活”。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撇开它过于功利的说教，其实意思还是不错的。所谓“开卷有益”，在读书中，既能增长见识、汲取经验，也能启迪智慧、陶冶情操。由于工作原因，我阅读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方面著作较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喜欢阅读一些文学艺术、历史文化、人物传记等方面的书籍。总之，多读书、善读书、读好书，在阅读中感悟和体味“慢生活”，有百益而无一害。

应该说，快与慢都是相对的。当今，信息化改变了世界，缩短了时空距离，降低了时空成本，使地球变成“村庄”，人类都是“老乡”；国家变成“家园”，大家都是成员；城市变成“家庭”，人们都是市民。与时俱进，才是最好的适应。

这本《昆明的眼睛》，是一个文学选本，选编了近百年来，海内外文学名家书写昆明的作品。作者包括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汪曾祺、杨朔、李广田等文坛巨匠，也包括当代本土的一些知名作家。其中一部分作品，我在上学时就读过，比如杨朔的《茶花赋》、李广田的《花潮》等。这些名篇佳作，不仅当时影响大、流传广，而且历久弥新、魅力恒久。让人在饶有兴致的阅读中，更加深刻地了解昆明的人文风俗、历史文化和城市精神。

本书作为展现“文化昆明”的一个重要载体，通过名家写昆明、名篇咏昆明，让人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欣赏昆明之美，理解昆明之魅。这本书所选的很多作品，原本就是名篇佳作，又经过时光淘洗，能够留传下来，本身也证明了这些作品的价值。据我所知，虽然名家写昆明的作品不少，却从来没有一个严谨的选本，即便专业工作者，也难以完整地找到这些作品，更何况普通读者。所以，选编这样一本书，让人一册在手，就可以欣赏到近现代以来抒写昆明的许多名篇佳作，实在是一桩值得去做的好事。在我看来，文学的意义在于记录了这个时代，并向人们传递作家对生活

的认识、思考、理解和判断。《昆明的眼睛》里，不同时期的作家，看到的昆明也是不同的。但总的来说，他们表达了对昆明独特的历史文化之美、高原风光之美、民族风情之美和都市时尚之美的发现和赞叹，颂扬了昆明城市文化的精神内涵。

人创文化，文化化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目标、以人为方向、以人为目的，发展人、改造人、提高人、提升人，把公民变成经济发展的主体、民主政治的主人、文化繁荣的主角、社会进步的主力，提高公民在市场和社會中的生存能力、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加快把人口变人手、人手变人力、人力变人才、人才变资本、资本变财富、财富保民生，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全面变革进步，人们的信念、理念、观念，思想、思维、思路不断与时俱进。

当前，我们紧紧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实施桥头堡战略两大历史性机遇，致力于把昆明打造成为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品质春城，成为“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世界休闲宜居之都和国际著名的“春城夏都、避暑胜地”。在这样的关键时期，更要注重提高昆明文化的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和创新力。近年来，昆明在厘清文化脉络，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做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工。既注重保护文物古迹等有形文化景观，更注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域文化、社会心理、习惯模式等无形人文因素。收集、整理和汇编描写昆明的优秀文学作品，也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应有之义。《昆明的眼睛》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希望工作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通过阅读本书，对昆明的历史变迁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幸福生活有更新的期待，对未来前景有更强的信心。

2011年8月28日于昆明

西部地区民族文化“走出去” 的战略意义^①

李 锐 张德寿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文化与科技教研部; 党建教研部)

中国西部地区民族文化为什么要“走出去”? 这是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之大势所趋。全球化趋势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 也发生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 它深刻地改变着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走向, 同时也影响着人们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变化。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 相对于政治和经济的“硬力量”, 文化是一种“软力量”, 但是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却是持续不断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凭借其经济的强大优势, 趁着全球化的浪潮, 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进行文化扩张, 推行文化单边主义。在赚取了大多发展中国家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同时, 也输出了其文化价值观。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 世界各国也迅速地调整本国的文化战略来积极应对。中华文化“走出去”, 就是中国政府调整自己文化战略的一项重大内容。西部地区民族文化“走出去”, 是中国文化“走出去”

① 基金项目: 本文系李锐主持的 2006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部地区民族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 06XZX005, 已经结项) 的部分成果, 该课题的其他一些内容还将在本刊陆续发表, 敬请关注。

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政治角度来看,它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化更加主动地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将一个发展的中国、开放的中国、文明的中国的全新形象展示给世界;以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新贡献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国家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和谐共处,在新的国际文化秩序重建和文化力量格局重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文化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西部地区在日益激烈的综合竞争中,最独特、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就是文化资源。尽管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如果能顺应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历史潮流,利用资源优势,把文化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样就能谋求地区经济社会的超常规发展,从而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①

一、全球化带来的开放的必然性决定了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必须走出去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预示了全球化的到来。今天,全球化已然是事实,并且在急剧地推进。这是实施西部地区民族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个世界性背景。认识实施西部地区民族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必要性、必然性,首先必须对全球化带来的开放的必然性有深刻的理解。

全球化的本质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就从现象上说,许多方面是一致或相似的。全球化波及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原有封闭就被打破,或者就形成必须打破的压力。就基本的事实看,在这样的背景下,随之而来的要么是人为地抵抗,试图通过封闭来消解危机、来维持某种独立的自保;要么就是在矛盾冲突中被打得七零八落;要么奋起自新图强,逐渐走向开放,逐渐地把被动化成主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以后,以经济的强势、以文化的强势、以武力的强势到处殖民,对被殖民的地方产生的

^① 丹增:《论我国西部文化产业的特色发展道路》,《新华文摘》2006年第7期。

影响大体上就是这样。所以,谈论全球化撇开资本主义是说不清的。从政治上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从经济上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从文化上说,资本主义是一种文化现象。政治也罢,文化也罢,经济也罢,背后的逻辑都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扩展本性。而技术的不断改进,使这种扩展有了更强劲的基础。资本主义肇始于西方,因此,有人说,全球化就是西方化。仅就现实的格局和诸多现象看,不能不说,这种观点没有道理。

全球化发生的基础是经济生产一反自然经济时代,追求工业化、科学化和商品化。它由此带来的后果,一言以蔽之,普遍联系。由此,全球化的本质性——现实层次上的相互依存、联系和影响的特征日益显现出来。所谓现实层次,强调的是今日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乃至行业与行业之间相互依存、联系和影响不是哲学思辨意义上相互依存、联系和影响,而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发生着的问题,区别只在于这其中的关系是间接还是直接,目前达到了何种程度。中国选择市场经济,实际就开启了中国融入全球化潮流的时代。就整个世界而言,如果说在全球化的早期,欠发达的地方还可以通过拼命地封闭抵抗来谋求某种独立自保的话,那么,发展到今天,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首先是工具的极大改进,比如交通和通讯,为商品的交换、人员的流动和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越来越多的便利;其次是世界生产发展累积形成的格局。从总体上说,世界任何地方想外在于外部的环境维持自给自足已经不大可能了。世界经济形成普遍地联系、形成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再次是跨国资本的强大力量。资本总是要寻求利润。为了利润,它可奔赴到任何一个角落。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无论是哪一方面,总体上都处于优势的地位。跨国集团利用资本的优势、利用技术的优势、利用管理的优势、利用自己定义的世界经济的规则体系的优势、利用本国政治的优势,以及利用被西方控制的国际组织的优势,

无孔不入，对传统的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现在的跨国集团，从一定意义上说，俨然已成国中之国。最后是观念的变化。至少冷战结束以后，原来国际政治集团严重对立所掩盖了的、所压抑了的谋求经济发展的冲动被释放了出来。而为了发展经济，把自己置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通过开放发展自己，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基本共识。至于某些地方、某些国家还在封闭，那仅仅是诸多复杂的原因造成的特例。总之，世界发展到今天，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累积，已经形成了一种势。这种“势”就是造成开放的必然性力量。这种“势”的影响也必然作用到文化的开放与发展上。

“势”实际是一种综合因素构成的外在力量。首先，它带来的是一种压力。由于事实上存在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甚至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发展程度不一、发展不平衡，在业已形成的普遍联系和竞争的现实大格局中，压力往往与自身发展的水平成反比。越是发展水平低，产生的压力就越大，应对不好，在整个竞争的大环境中就将越来越处于被动的地位。其结果，封闭几乎成为不可能，封闭迟早要被打破，开放哪怕是不得已，也必然成为选择。一句话，在今天的时代，开放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是势之必然的问题。其次，它带来的可能是一种机遇。加入一种外在综合因素构成的力量，实际是借了势。所谓顺势而为，就是借势，就是通过他者的力量来成就自己。能否变成现实，当然有操作的水平和能力问题。这就是说，借势未必能成功，成功同样是多种因素恰当匹配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违背一种大势所趋的力量，与之较劲，第一步就错了，除了被动应对以外、除了最终无可奈何花落去以外，别无他途。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的开放也自然是必然的问题。我们可看到，“全球化使文化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人们拥有了更多共享文化产品、文化成果的机会，文化共性增加。同时，文化因素渗入国际经济、国际政治中去，出现经济文化化、政治文化化等现象。文化问题日益成为敏感的问题，文化战略也被各国相继纳入国际战略之

中。”^①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部地区民族文化要走出去，首先是由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决定的。换言之，西部地区民族文化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契合时代大潮流的要求。这个大潮流的核心就是开放。在文化建设上，请进来是一种开放，走出去也是一种开放。作为一种有组织、有规模、有计划地“走出去”，当然只能发生在开放的条件下。可以说，走出去是在某种身不由己的大势下选择了主动。但这种选择却在为自身获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主动选择即是顺势而为。以历史眼光看，这是一条获得发展的基本经验。

中国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到今天已有 30 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选择。如果回望一百多年来中国探索国家图强的艰难之旅，改革开放的意义至伟至大。清王朝逆历史潮流而动，封闭僵化，带来的是整个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带来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当时同样面临空前危机的日本，却坚定地选择了维新变法，结果这个千百年来奉中国为文化导师的岛国民族走向了强盛，反过来把老师打得鼻青脸肿。历史的教训何其之大！维新变法实质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今天，谋划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如果不从顺应潮流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其意义是抓不着这个世界发展的本质的。说千道万，是因为当今时代不是自然经济为主、可以封闭起来自我维持自我发展的古代，而是市场经济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推动下高度发展的全球化时代。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这是中国人民在国家独立的状况下做出的主动选择。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融入全球化潮流，并以强劲的发展势头预示着它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是人类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事件。没有改革开放，不会有中国今天的发展格局与势头。如果说前面是以反面的例子证明了顺应潮流对于谋求国家发展是何等地重要的

^① 张骥、刘中民等：《文化政治与当代国际政治》，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5 页。